

# 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

王卫东<sup>1</sup>, 郭红<sup>2</sup>

(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001; 2.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清末至民国绥远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移民社会特色的地域, 其天主教的传播和移民社会紧密相联, 而其间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土地。教会因用土地吸引移民入教而大为发展, 又因土地占有等种种因素与普通百姓产生矛盾, 以致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到重重一击。

**关键词:** 天主教; 绥远; 传播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05)03-0056-05

自17世纪后期, 随着人口不断的增加, 华北长城以南的人口掀起了向北疆迁移的浪潮。虽然清政府屡下禁令, 但移民边疆的趋势已不可遏制。经过两百多年的人口迁移和发展, 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及民俗文化诸方面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 绥远地区<sup>①</sup>作为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它的发展历史无疑和迁入该地的移民息息相关。自清初以来至20世纪40年代末, 移民及其后裔逐渐成为绥远的社会主体, 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剧烈的变迁, 成为20世纪前后当地发展的基础。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使这一带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变为以耕作农业为主, 土地占有方式及租佃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还影响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宗教因素而言, 移民也给当地带来了新的信仰——天主教。由于清代中后期当地的特殊政治、经济形式和传教士的艰辛推动, 清末及民国时期天主教在绥远获得了大的发展, 一度改变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结构。

## 一、移民与天主教的传入

清初, 长城虽然仍是限制蒙汉交往的障碍, 但随着内地人口增加, 人地矛盾不断加剧, 尤其是灾荒年份, 河北、山西、陕西的百姓不顾清廷的禁令而出口垦殖, 形成了几次移民的高潮。清末至民国的放垦, 更是鼓励和吸引了大量人口移居口外, 使移民的浪潮前后相继。原有居民的稀少和大量移民的进入, 使得绥远地区在清代及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了与他地不同的特征: 主要人口以从北直隶、山西、陕西迁至口外的贫苦农民及其后裔为主; 原有的大量未开垦的土地成为吸引移民蜂拥而来的力量; 文化教育相对落后, 新移入的大量汉族人口中没有形成强势的宗教信仰。天主教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绥远并获得了较大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传教特点: 一是信徒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主; 二是土地成为吸纳信徒的有力工具。

1700年前后, 也就是在康熙年间清廷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尚可的时期, 耶稣会传教士已经力图进入蒙古, 在绥远地区已有为数不多的信徒, 主要是“因耶稣会传教士而替教的士兵”<sup>[1](P12)</sup>和少数汉族百姓。

收稿日期: 2005-03-21

作者简介: 王卫东(1974-), 男,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郭红(1973-), 女, 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sup>①</sup> 绥远地区主要指1928年民国政府设立的绥远省辖区, 主要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盟(商都、化德二县除外)、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盟(磴口县除外)、伊克昭盟、乌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陶乐县及陕西省长城以北的部分。

在天主教内蒙古传教史上必然要提到西湾子(即今河北崇礼),这个地方虽然属张家口厅管辖,但地近绥远,清代中后期的人口构成与社会各个方面都与绥远地区相似,是天主教在蒙古传教的基地。根据《西湾圣教源流》的记载,西湾子最早的教民可能为一从北京迁至口外的张姓教友。至1726年,西湾子已有一座秘密的小堂,信徒主要是当地贫苦农民,而这些农民多是移民或其后裔。西湾子是先有教友,至1829年才有本堂神父。在1858年之前,西湾子一带往西包括绥远地区的教友有两种情况。

一是原本从关内迁来之前已是教友。“有很多关内的教友迁居于此,他们到这里来的原因,一方面是为寻找耕地以谋求生计,另一方面也为躲避官方的仇教查禁,以善守教友本分”。<sup>[1](P14)</sup>

康熙、雍正至嘉庆时期正值山、陕百姓移民口外的高潮,内地的禁教使得遭到迫害的教民们,恐于教难,从北直隶及山西太原、大同等地同一般贫困的农民一样辗转迁移到口外地区。在内蒙古天主教传播史上,这些较早迁移至绥远的教友移民的意义远远大于偶尔前往或路过蒙古的一些神父。可以说绥远地区的天主教最早并非由传教士带来,而是由这些教徒移民传入。绥远地区见于记载比较早的教友移民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由山西忻县迁至蒙古,<sup>[2]</sup>此后陆续有少量教民迁入。乾隆年间在阴山南北都有教民生活。绥远地区的天主教首先由教徒而非传教士带来,这一点与其在中国其它地区传播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禁教时期,为避人耳目,这些教民及其后裔迁住在最偏僻的地方,少与外界联系,因而久不为人所知。但是已有传教士在这些地方暗地里活动,仅从太原方面,大概三年乃至五年,即有教士暗中至上述地方巡回一次,传教士“及至传教地方,藏于热心的教友家。昼则隐伏,夜则巡行。所受困苦凌辱,多为后人所不知,无从记载”。<sup>[3]</sup>教友开始见诸于世,是随着这些村落教民的人口繁衍,出于自身信仰的需要,向北京以及太原申请派遣教士来这里。从北京派遣教士是咸丰至同治年间的事情,最初受派遣的是属于味增爵会的法国人R·P·休阿里埃和中国人吴某二人,休阿里埃装扮成医生进入该地区。<sup>[4]</sup>当时传教士多以游历的形式,匿藏于教友之家,进行宣教活动。

1844年内地天主教弛禁后,因归绥道地方严格限制天主教的传播,所以同治之前该地区天主教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每因教友以教律不出迎神赛会拨款,亦如教外人不纳主教堂建筑贍礼等费用,而无知愚民藉此与公教为难,且有若干地方官故事拘禁教友,迟久不判,即判,亦少秉公,是以教务总受打击,教友仍多避处深山背巷”。(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19页)同治初年,天主教在绥远地区传播的地点多集中在岱海川、大抢盘及后坝等地,教徒数量也非常少,至1865年,整个内蒙古的教友也仅约有5000之谱(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19页),绥远地区的教徒数量之少也可想见。

另外一种教民是在迁至口外后入教的移民及其后裔。19世纪中叶后,移民及其后裔成为绥远天主教教徒的主要来源。绥远地区的村落绝大多数形成于清代,人口主要由移民及移民后裔构成。根据《地名志》等资料进行统计后可发现,雍正、乾隆时期和光绪至民国初年是绥远吸纳移民的两个高潮。天主教与移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发生在第二次移民高潮时期。

清初以来,口外的大部分土地属于蒙古人的游牧地和官方牧场,人烟稀少,而长城以南山、陕、北直隶等地由于人口增多,人地矛盾突出,口外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对内地的农民充满了吸引力,河套等有便利灌溉条件的地方更是移民迁入的热点。从初期的雁行人到定居,向口外迁移成为清代至民国山、陕、北直隶等地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虽然移民早在清初已进入口外,并在清朝中期形成移民高潮,但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在光绪之前法令上仍是封禁蒙地,禁止汉人移入口外垦殖。另一方面到了清代中后期,部分蒙古地主为了自身的生存愿意将土地租给汉族移民。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默认了他们存在的事实及或租或垦荒得来的土地。

同治朝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在绥远采取的禁教政策,当地的传教非常艰难。光绪年间,随着沙俄引起的边疆形势的大变化和清朝口外封禁的放松,大量移民不断涌入绥远。而此时天主教在中国也逐渐取得越来越多的特权,在绥远传教的圣母圣心会利用当地的土地优势吸引了刚迁来的贫苦少地的农民入教,使得传教事业获得了充分发展。绥远这一块人们印象中精神上应是在喇嘛教统治下的地域,清末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在宗教、经济、政治各个方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 二、移民、土地与传教

同治末至 1900 年庚子事变之前是绥远地区天主教的大发展时期。同治之前,天主教主要在归化城以东的地区发展,进入光绪朝,其传播的地区逐渐向西扩展,至 1882 年对内蒙古三个教区重新划分时,西南蒙古教区所包括的地域已扩大到“伊克昭盟、额鲁特阿拉善旗之东部、乌兰察布盟之乌拉特旗、茂明安旗、土默特之西部,若以县分论,则有萨拉齐县及今之固阳县、包头县、东胜县、安北设治局、五原县、临河县、宁夏省之东北部,以及陕西省之西边”。(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 25 页)

虽然口外的汉人移民垦殖浪潮早就开始了,但是由于最初所定传教对象及中国政府的限制,蒙古地区的天主教教士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土地在这里的意义。最初他们仍然用传统的方法传教,并企图和喇嘛教争夺蒙古族信徒。由于向蒙古族传教之难,在 20 世纪之前,整个蒙古地区教民以新迁来的汉人移民及其后裔为主。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及口外土地的大量开垦,教士们也逐渐看到土地和移民在这个地区的重要作用,于是开始设法将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与土地开垦紧密结合在一起。虽然说天主教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曾有大量的土地,但是没有一处像口外这样——土地在传教中显得如此重要,日益成为吸引教徒的主要手段。

1875 年之前,热河以西的口外地区并没有大教案发生,这是因为当地除了在观念上对外国传教士的排斥很少之外,天主教虽然已经在西湾子至丰镇一带的乡村获得一定的发展,教堂数目逐年上升,但是教民数量并不多,1868 年时蒙古教区仅有主教一位,外国传教士十人,中国神父六人(见于同治七年八月初四日《教会公报》)。1874 年德玉明等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来到蒙古西部,在这里实施以土地吸引农民的传教方法,同时张家口外、丰镇一带教会也开始大量取得土地,使传教事业在蒙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可以说 1874 年前后是天主教在蒙古地区传教方法和事业的重大转折时期,其关键之处就是占有土地吸引移民入教的传教方式的使用,土地为 19 世纪末天主教在蒙古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

初期教会并不直接租种或购买土地,而是帮助教民购买或占有土地,藉此发展天主教势力。迁移到口外的汉人大多为农民,且多是由于在内地遭受灾荒时被迫背井离乡,他们根本没有土地和牲畜,能得到教会的支持,是最好不过的。这也是口外地区天主教发展的最佳契机,传教士们“或施放赈粮,或无利借贷,用疏民困。是以农民之感戴益深,而皈依公教者日众”。(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 5 页)同光之际,教会开始直接从蒙古王公手中租种那些原本无人耕种的荒地或购买土地,以入教为条件,将土地分给从口内迁来的贫民,并给以一定数量的耕牛、农具、籽种等物资,帮助他们定居下来。这些东西对于一贫如洗、流离他乡的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只要教会控制了土地,就控制了耕种其土地的农民;教会占有的土地数量愈大,其拥有的教民也就会越多。

租种教堂的土地是以入教为条件的,领地之前须经过传教士严格考查,“教民凡种教堂方面之包租地者,其领地手续一般相同,即先请各该堂司铎允准后,再向各该堂会长领取耕地,通常各该堂会长等对于教民之个性及其家庭状况、经济情形、生活能力等均有一番考察,故能按实际情况,酌拨耕地,藉以安定其生活”。<sup>[5](P3)</sup>

以土地吸引农民入教最初对教会与农民都有利,“教堂方面通常采取蒙旗习惯之分收方法,即视耕地优劣,待耕作物成熟之后,即与耕者按三七或二八分收农作物,此种分收成数,取决于领地之时,视即中等年岁之好坏,二者同甘苦,共利害”。<sup>[5](P3)</sup>对于饱受苛捐杂税的农民而言,租种教堂土地“颇少其它临时变动,教堂亦不再立其它租税名目,耕者舍此之外,亦无其它负担”,<sup>[5](P3)</sup>教会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也使他们可以摆脱地方官府等的压榨,入教即意味着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而对教会本身而言,土地不仅使教民数量增加,地租也为各个教堂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19 世纪,耶稣会、遣使会先后在蒙古地区传教,1865 年始,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取代了遣使会。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圣母圣心会一直掌握绥远的传教事业,天主教在蒙古及陕甘宁的成败得失均与其有密切关系。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到达蒙古后不久即意识到土地在传教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开始争取土地,



“实行根本大计”（《西北周刊》15期何鲁《五原小天主教国》），“辟地日广”。<sup>[6](P1)</sup> 1883年后任西南蒙古教区主教的德玉明充分实践了这种利用绥远地区移民社会特点的传教方法，在内蒙古西部的三盛公一带大量购买土地，并转租给入教的百姓。

土地不断增加使得教会不仅吸纳了众多的有移民背景的教友，同时也使教会看到了扩展影响的另一种用移民的方式进行传教的方法——当一个地方教民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教会即组织部分教民迁移到新的地区建立村庄。开始是西湾子的教友“有不少人为寻找新的土地而外迁”，<sup>[6](P163)</sup>建立了一些新的教友村，寻即教会发现这种传教方式非常有效，遂广泛采用。二十四顷地是绥远教会建立移民村并向外扩展的典型。1880年，陆殿英司铎在萨拉齐东南购买了24顷河滩地，迁移教民立村传教，村名即为二十四顷地村。<sup>①</sup>教堂地的收获除供教友食用外，其余用来劝人入教，不几年，入教者倍增。为了扩展教务，1889年后，二十四顷地教堂还在外购买土地并向外迁送教友，并在新购置土地上建立教堂作为新的传教基地，形成了银匠窑子、程奎海子等村落。附近的大喇嘛窑子、高商人窑子、小巴拉盖、苗六圈子、三道河子等地都曾接纳过二十四顷地教堂迁送的教友。至1894年土木川教区教民数已达1934人，“传教司铎之忙碌，远逾于曩昔。至于教友之分布，几及五十余村，而萨拉齐县境内之人民亦皆家喻户晓，知有此天主教矣”。（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27页）

对于同治年间出现的传教士购买或占有土地的情况，总理衙门曾提到蒙古“游牧地亩，向禁开垦，教士亦不得与地方人民勾通希图私置”。（见《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册“总署致法国公使罗淑亚节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对待清初以来蒙古的土地封禁政策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要完全严禁，“不能独严教民之禁，并令将未垦之地概予切禁”。（《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册“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附与庆都护来往函稿”）另一种认为在严厉封禁中，应该考虑到蒙地的实际情况，允许灵活处理。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注意到口外蒙古人为了生存出租土地的必然，不能教士窥视就因噎废食、全面封禁，建议对不同的土地采取不同的方法，内务府及太仆寺牧场尺寸不许开垦，蒙人游牧地则可招租，土地只租不卖，不能租于教民，也不准佃户私自将土地捐与教堂。当时许多官员对此提出疑虑，李鸿章认为“此案事关大局，外族之阴谋叵测，不可不严防，而蒙旗之生计维艰，亦不可不熟筹深虑”。（《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册“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就口外实际情形来讲，汉人从康熙年间始已大量进入蒙古，口外的开垦已经既成事实。随着汉人不断涌入以及沙俄引起的边疆形势的大变化，不管是严禁还是部分封禁都已不可能，教会获得土地也成为必然。在1895年清廷允许口外地区的天主教会自由购置土地房产之前绥远地区的教会已拥有一定的土地，此后更是大量购置土地，不但吸引了大量移民入教，而且增强了天主教会的经济力量。1900年绥远地区的天主教遭受义和团的重创，但是在事后获得了巨额赔偿。许多盟旗由于无力偿还巨款，只能以土地代替。所以1900年后的几年时间内，绥远的教会获得了大量赔教地。加以1902年蒙地全面放垦后大批移民的涌入，天主教迅速发展，形成国中之国。

### 三、土地与义和团运动

对迁移至口外地区的农民来说，土地是其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传教士以土地来吸引农民入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治之后内蒙古天主教借着土地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传教士取得土地的途径除了合法购置和贿赂蒙古王公取得一部分土地的耕种权外，就是强买或霸夺，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由土地而起的争端。其中对内蒙古教会冲击最大的当属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绥远教会遭受极大损失，部分教友村被攻破，“义和团之乱以前，中蒙古有教友16000人，战乱时死亡的教友达1800人，并有5位神父致命，数座圣堂被焚毁，遭受迫害的教友无数”。<sup>[1](P66)</sup>之所以绥远地区的天主教会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和它在此占有大量土地、并利用土地进行传教有紧密关系。1895年传教士取得了在口外地区自由购置土地的权力后，教民依恃教会的庇护，横行乡里，

<sup>①</sup> 当时蒙古租买土地，一般不实地丈量，仅骑马巡视一周，即指为24顷，光绪二十六年，该地被划为六成地，翌年绥远将军奉命丈放，实丈土地110余顷，但二十四顷地村之原名仍相沿不废。

鱼肉良善，百姓对此则敢怒不敢言。义和团兴起后，当地百姓风从响应。

由于与普通百姓之间冲突不断，也由于绥远教会依仗特权不断插手地方事务，使得各地的官府对教会也有所忌恨。绥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肇始于萨拉齐、托克托二厅。1900年4月，萨拉齐厅二十四顷地村的天主教移民在托克托厅三百余教民支持下与当地普通百姓争夺土地，杀死准格尔旗蒙民高占年等九人，弃尸黄河，凶手潜匿教堂，清朝地方官员无法缉捕。此时，义和团运动由山西传入，义和团与当地百姓协助官兵攻破教堂，“故在托克托城外杀死之教友甚多”。（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29页）义和团传入归化城后，许多工匠纷纷加入，但因归化城教会、教民与普通百姓并无积怨，未对归化城的教会、教民造成大的损失，因此归化城土默特旗是几个旗中赔款数额最少的。

山西巡抚岑春煊总结口外地区教案的原因时言：“口外去岁酿祸之重，实由民教争地争利，积致猜嫌。即如丰镇一厅教士预租地，如刘拯霖、孟仕仁等案者，固已不一而足。托克托城亦因有水利争讼之案，殊不知地皆教民所种，与教士无涉。而教民等则必假所倚仗者，冀遂贪夺这私，不塞其源，祸何由息。此后口外遇有民教地案，止准教民具呈，教堂不必干预，庶可以杜无穷之患，收相安之效。大凡争礼争俗，其怨尤浅。至于争利则害有不可测者，此所宜预为之计也”[见《清末教案》每三册“山西巡抚岑春煊为请将教案第十一条内容照知各使事咨外务部文（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附件“拟定山西教案善后章程粘单”]。恰好指出了口外普通百姓仇教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在新的政治与宗教思潮影响下，绥远各地努力收回被教会占有的土地，使传教活动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加上清末以来日益严重的匪患，“绥境教堂之势力从此骤衰”，“在昔教堂势力大时，民众为求得教堂的保护与便利，入教者甚众，晚年旧教徒死亡，新入教者不如过去踊跃，故教徒人数逐见减少”。<sup>[5](P4)</sup> 萨拉齐境内之天主教至1941个拥有18571教民，（民国《萨拉齐县志》卷13“宗教”）较1932年减少了3425人。

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后，充分利用绥远地区的移民浪潮及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土地吸引移民及其后裔入教，并通过迁移教民建立移民村的方法扩展教会的影响。正是由于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对绥远当时社会状况的恰当认识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与土地、移民有关的传教策略，才使光绪以后天主教教会在绥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 隆德理. 西湾圣教源流[A]. 古伟瀛. 塞外传教史[C]. 台北: 光启文化事业, 2002.
- [2] 王守礼.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M]. 北平: 上智编译馆, 1947. 22.
- [3] 刘准.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M]. 河北: 献县天主堂印行, 1937. 373.
- [4] 前岛重男. 基督教在内蒙古——以厚和中心的概况[A].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2)[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4.
- [5] 一寰. 绥宁边区教堂问题[J]. 边疆通讯, 1943, 1(6): 1-4.
- [6] Daniel Verhelst. 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A]. 古伟瀛. 塞外传教史[C]. 台北: 光启文化事业, 2002.

## Immigrants, Land and the Catholic Spreading in Suiyuan Region

WANG Wei-dong<sup>1</sup>, GUO Hong<sup>2</sup>

(1.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01,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r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uiyuan was famous for its immigrants, and the region featured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migrant society and Catholic spreading chiefly because of land. On one hand, a great number of immigrants wer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for l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lso for land, the church and the civilians contradicted each other, thus undergoing a big hit from Yihetuan.

**Key words:** Catholicism; Suiyuan region; spreading

(责任编辑:周成璐)

# 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

作者: [王卫东](#), [郭红](#), [WANG Wei-dong](#), [GUO Hong](#)

作者单位: [王卫东, WANG Wei-dong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001\)](#), [郭红, GUO Hong \(上海大学, 文学  
院, 上海, 200444\)](#)

刊名: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12(3)

被引用次数: 1次

## 参考文献(6条)

1. [隆德理](#) [西湾圣教源流](#) 2002
2. [王守礼](#)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1947
3. [刘准](#)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937
4. [前岛重男](#) [基督教在内蒙古—以厚和中心的概况](#) 1988
5. [一寰](#) [绥宁边区教堂问题](#) 1943(06)
6. [Daniel Verhelst](#) [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 2002

## 相似文献(3条)

1. 期刊论文 [薄艳华](#) [清末绥远地区教案处理情况新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 24(5)

1900年发源于山东, 遍及华北大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迅速点燃了绥远地区反洋教斗争的火焰, 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是全国和内蒙古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是他们在运动后凭借帝国主义的保护和巨额赔款, 势力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更加紧了对绥远地区文化和经济上的侵略。

2. 期刊论文 [牛敬忠](#) [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也谈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33(4)

长期以来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与绥远地区民众发生的冲突, 尤其是在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在绥远地区爆发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无论是土地问题上的冲突还是日常民事纠纷在一定情况下都是可以解决的, 而文化、风俗习惯上的冲突则是不可调和的, 它可能造成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立, 从而形成所有社会成员(不论其是否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之间的冲突,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义和团运动的群众性了。

3. 学位论文 [刘青瑜](#) [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 \(1865—1950\)](#) 2008

近代以来, 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内蒙古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 同时, 他们还进行了许多其它方面的活动, 如办医院、办学校、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等。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内蒙古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 在概述传教士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传教士在内蒙古除传教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活动, 包括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 进而总结他们的这些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影响。

序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和目的、研究的概况、资料情况、研究的方法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以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为基础, 重点概述了天主教传入内蒙古的情况。第二章从医疗、教育、慈善、抗战、传教士对鸦片和匪患等社会问题的处理等方面, 详细考察了传教士的社会活动。进而总结出传教士的社会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本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以绥远公教医院为个案, 深入探讨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所进行的医疗活动。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考察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办的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第三部分从救济灾荒、兴办育婴院及安老院等方面具体研究了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公益慈善活动。第四部分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对内蒙古的重要贡献。第五部分详细考察了传教士对内蒙古社会存在的鸦片和匪患问题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第三章以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考古学和蒙古学科学研究活动为重点, 深入探讨了传教士的科研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

在考古学方面, 主要分析考察桑志华、德日进、冈宣化、梅岭蕊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 并阐述了传教士的考古成就对内蒙古考古学的影响。在蒙古学方面, 文章具体研究了传教士田清波和赛瑞斯两位蒙古学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对内蒙古学术界的影响。结语部分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置于中国和内蒙古近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 and 评价。并得出结论。文章认为, 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展的各项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对内蒙古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天主教传教士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 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他们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确实对内蒙古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活动, 一方面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 另一方面, 传教士们通过这些活动也把内蒙古介绍给了世界, 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内蒙古。可以说, 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

## 引证文献(1条)

1. [张彧](#)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传教活动研究 \(1865—1911\)](#) [学位论文]博士 2006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dxxb-shkxb200503009.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dxxb-shkxb200503009.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dc474b99-a1d3-45a7-861d-9e4d006e9cde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